

本期专题·执政党整风

- 02 中央整治干部“四风”
- 05 政治局6天半会议花60多天准备
中央曾听取老常委意见
- 08 中央国家机关带头过紧日子
一般性支出压减5%

国是论衡

- 10 周其仁：再难也要坚持

政坛经纬

- 12 两会后第四波人事更替：12省份常委密集调整

八面来风

- 14 中国缺席全球腐败报告
- 15 中青报空难报道献媚言论引网友痛批
- 16 纽约时报：美国如何利用科技扫荡全球数据

历史深处

- 19 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丰碑

悦读时光

- 封三 毛泽东自称三本书让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一）

编者按：201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2周年的日子。在距离百年大党越来越远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风险也是空前复杂。任何组织都是一个有机体，都要追求“健康”，执政党也不例外。

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承诺，要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下大力气解决。而从十八大到现在，新一次的执政党整风行动的轮廓也日益清晰。

其基本逻辑就是，从民众最容易产生不满，并且常有切肤之痛的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入手，让干部们“洗澡”、“治病”，以此进一步树立中央权威，提高执政的公信力。“‘四风’问题解决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其他一些问题”，今年以来，执政党已经提出了几个，比如党员的适度规模、党内“立法”等，更深层次的则是党内权力结构的改革问题。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群众路线实践教育应当“开门搞”。这也是检验整风最终成效如何的试金石。开门，就是向普通党员开门，向党外尤其是“群众”开门。不如此，反官僚主义最终可能会被官僚主义消解，反形式主义也可能会变成又一种形式主义。

值此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际，本刊推出“执政党整风”专题，供各位领导参考。其他栏目的文章祈盼得到您的关注。

主 办：盐城市图书馆
刊头书法：臧 科
主 编：刘 进
责 编：周玉奇

地 址：盐城市城南新区府西路6号
邮 编：224005
电 话：0515-69971581 18961988622
邮 箱：75156450@qq.com
网 址：www.yctsg.cn

设计制作：盐城市圆融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中央整治干部“四风”



“四风”刹不住，公平正义问题就解决不好，执政基础就会动摇。（谢正军/CFP/图）

“明确了要借鉴延安整风中成功的做法，但肯定不是照搬，会有很多创新。”

群众路线不能以群众路线为名，把一个个体的利益给剥夺了。

201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2周年。不少省份和国家部委机关，都选择在这一天召开了同样的会议——部署“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这场活动旨在反对官场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活动自2013年6月18日起在全国展开，为期一年。

7月1日当天，广东、河北、山西、广西、江苏等地都召开了部署、动员大会，民航局、国土部、最高法也召开了同样的会议。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安身立命之本。”全国政协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要保证执政地位不动摇，就离不开群众

支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前，中央曾多次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刘峰是受邀者之一。

党代会之后的惯例

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自十五大以来，每次全国党代会后，党内都会有一次集中性的主题教育活动。如十五大之后的“三讲”教育，十六大之后以实践“三个代表”为主的先进性教育，十七大之后学习“科学发展观”，这些内容都被写进当届党代会的报告中。

中央党校党建部政党史主任祝灵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每一次集中教育所选择的主题，都是基于对当时世情、国情、党情的基本判断，此外就是针对党的建设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和那次党代会报告的主题相吻合。

1995年11月8日，时任总书记江泽民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随后对县级以上干部进行了“三讲”教育。十五大后，中央在1998年11月又发出了继续进行“三讲”教育的意见。

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说，这是因为当时市场经济刚兴起不久，人们更关注经济效益，对学习、对政治、对正气关心较少。十六大后开展先进性教育，是因为当时党员数量越来越多，共产党规模越来越大，承受的领导责任也越来越重。当时存在的问题就是“能力恐慌”。十七大后，提出科学发展观，则是对过去唯GDP至上

的一个纠正。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这次集中教育的主题，十八大之前已经开始调研，按照中央大调研的部署，中央组织部承担了“党的纯洁性建设”这个课题。在考虑十八之后的集中学习主题时，中组部提供了两个建议供中央选择，一是党的纯洁性建设，二是群众路线，中央采纳了后者。

这次进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反对党内的“四风”，要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在刘峰看来，这既是高层的战略意图，也是群众的现实要求。

他说，从高层来说，共产党要确保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而执政基础绝对不能离开群众基础。要逐步实现中国梦，也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和行动。

对群众而言，现在老百姓不仅受教育程度高，最主要的是自主性强，对执政党要求也在提高。“绝大多数群众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刘峰说，但另一方面群众也觉得不少官员把权力拿在手里，给老百姓的权利不够。有些干部生活享乐很过分，弱势群体的困难得不到解决。老百姓对“四风”的意见很大，中央开展这次活动，可能会帮这些干部“洗洗澡、治治病”，老百姓应该是欢迎的。

在祝灵君看来，共产党要能获得群众支持，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能维持社会稳定秩序，其次能使民富国强，第三能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前两个共产党总体上能做到，现在最大问题恐怕就是公平正义问题。“四风”刹不住，公平正义问题就解决不好，执政基础就会动摇。这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大背景所在。

另外，当今世界在多元化趋势外，一个新态势是个性化社会的到来。祝灵君说，随着全球化、因特网、社交媒体发展，人人都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人人都有利益诉求，且利益难以聚焦，社会弥漫着情绪，易出现非理性化倾向。它对政党尤其是大党、老党的挑战正在变成一个世界级的政治学难题。如在欧洲，几乎所有大党、老党的认同度都在

滑坡，反而一些小党如鱼得水，它们在个别议题上容易引起共鸣、聚焦。

为何多了“实践”二字

刘峰说，过去无论是“三讲”、“三个代表”还是“先进性”教育等，名称都没提“实践”二字，2008年的提法有所改变，叫“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而这次将活动本身定名为“教育实践”活动。

“突出‘实践’，这意味着要重落实。”刘峰说。这次中央说得很清楚，就是要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中央文件中列举当前领导干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办实事；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

同时，当前社会又存在大量与群众具体利益有关的突出问题，如教育、医疗、卫生、环保、食品安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这些问题应如何解决？刘峰认为，过去说到群众路线，就是把群众当亲人，但那只能适应过去的年代和当时老百姓的认识水平。现在新形势下，必须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综观这几次主题教育，另一个明显变化是，最近几次党代会后，集中教育活动启动时间越来越早。“先进性教育”是十六大召开两年后启动的，“科学发展观”是十七大之后一年启动的，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活动启动时，离十八大的召开刚过半年。“说明形势越来越紧迫了。”刘峰说。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十八大后，就这次活动，中央有关部门组成6个调研组，于2012年12月下旬到今年1月中旬，分别到部分省区、部委、高校、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进行了调研。

2012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中组部召开了专家座谈会，刘峰也在会上作了发言。此后，刘云山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赵乐际又分别组织召开了多次专家座谈会。

与历次集中教育一样，中央这次也成立了领导

小组，刘云山任组长，赵乐际、赵洪祝等人任副组长。为监督教育实践活动质量，中央还成立了督导组，督导中央机关和各省教育实践活动。在中央机关，一般取能相近的部门由一个督导组督导，如社科院、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等就在一个组，组长一般都是由尚在“二线”的部级干部担任。

借鉴延安整风中的成功做法

“这次中央吸收了一些专家意见。”刘峰说，2012年12月30日，在刘云山主持的专家座谈会上，一些专家提出集中学习时间不要过长，不要搞形式主义。

最后，中央意见就是活动为期一年，过去的集中学习一般都是一年半到两年。这次活动重在“实践”，与过去重在教育也不一样。此外，这次教育实践不再搞试点，过去经常先搞试点。

这次活动主要针对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习近平、刘云山在讲话中都提出，要用“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明确了要借鉴延安整风中成功的做法。”刘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也会吸取过去集中教育如‘三讲’、‘三个代表’的经验，但肯定不是照搬，会有很多创新。”

按照部署，本次活动将自上而下进行，共分两批开展。第一批为省部级领导机关和副省级城市机关，及其直属单位，此外还有中管企业、中管高校。第二批为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中央尤其强调，要突出抓好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执法监管部门和窗口单位、服务行业。

和以往不同的地方是，这次活动将“不转段”。以前每个单位内部的集中教育往往有多个阶段，结束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接着又转入第三阶段，要出很多简报，时间拖得很长。这次明确规定不转段、不搞简报，每个单位“整风”时间控制在三个月左右。

刘峰认为，这么做的好处是可留出更多时间去听取意见，去查摆问题，去整改落实。过去转段，每个阶段都要总结、汇报，前一阶段不结束，进不了下一阶段，耗费时间、精力太多。

每个单位的“整风”，一般将按三个环节进行，第一是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第二是查摆问题，开展批评，包括自我批评。中央要求在这个环节，每个部门都要召开一次专题民主生活会，主要领导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上级督察组要全程参与，对反映问题较多的班子成员，督导组要进行谈话提醒。第三个环节是整改落实，并建章立制。

“群众路线是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祝灵君说。中共建立之初，二大党章指出，“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1942年，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81年6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群众路线的表述进一步明确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修订的党章中又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党对群众路线的权威规范表述。

刘峰认为，从井冈山时代到现在，一直在提群众路线。有时效果好些，有时不尽如人意。主要原因是一些官员嘴上讲群众路线，骨子里仍然高高在上，把自己看得比群众高明，颠倒了主仆关系。“没有一个个群众，哪儿来的群众路线？”刘峰说，群众路线不能以群众路线为名，把一个个体的利益给剥夺了。

在他看来，另一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通过制度化让群众当主人，让共产党人当仆人。就拿选举来说，本来应该是老百姓看好一个干部去“举”的，但现在往往不是“举”而是“拔”，上头看上一个人，说“拔”就“拔”上来了。

刘峰说，共产党的领导、群众当家做主不能少，依法治国也不能缺。这样才能限制官员的权力，增加老百姓的权力。“依法治国一定要强化，否则群众路线就落实不了。”

(7月5日 南方周末 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贺佳雯)

政治局6天半会议花60多天准备 中央曾听取老常委意见

这是推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举措；

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具体行动——

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实际和所分管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度规定。

6个半天的会期，60多天的准备。会议召开背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顺应广大干部群众期待，进一步加强自身作风的生动实践。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作风建设

作风问题关系党的事业兴衰，事关执政根基的巩固和执政能力的提升。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职伊始，提出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

“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

得群众信任和拥护。”

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党自上而下分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带头开展。

5月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意见》，明确提出：“今年6月，中央政治局将召开专门会议，总结检查八项规定的落实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制定并贯彻落实八项规定，深得党心民心；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带头示范，赢得全党全社会高度评价。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主要解决什么问题？全党对中央抓作风建设有哪些期望？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得如何？如何把作风建设推向深入？……党中央始终在研究、在思考。

去年12月底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听取专题汇报，先后17次作出重要批示。

习近平提出，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特别是基层群众意见，摸实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状况。他强调后续工作要不断跟上，坚决防止走过场、一阵风，切实一抓到底，同时要完善作风建设的有关制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准备工作中，始终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进行。

为了开好这次专门会议，从4月初开始，一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调研和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的工作，在全党全国一定范围广泛开展。

深入开展调研、广泛听取意见，这是一次发扬民主汇集众智的过程

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为全面了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相关部门，于4月中旬起开展了专题调研。

一组扎实的数据令人信服——

河北、内蒙古、浙江、广东，中央党校、公安部、财政部、国管局……调研组分赴9个省区市、11个部门和单位，召开30多场座谈会，访谈80多位省部、厅局级领导干部，听取500多位党政干部、党外人士、基层群众和媒体记者的意见建议，对31个省区市、53个部门和单位进行书面调研……

一张详实的表格重点突出——

《各省区市贯彻落实八项规定项目统计表》清晰地反映出全省性会议次数、天数、参加人数，文件简报数量、种类、期数，会议、接待、车辆购置、因公出国（境）费用……每一项科目都要求把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的数据与上年同期进行对比。

一项科学的调查全面真实——

为更好了解人民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的评价与建议，国家统计局受中央办公厅委托，采用国际通行的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方式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范围覆盖12个省区市，调查样本量24000个，调查对象覆盖城乡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政

治面貌、职业等群体。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

在全面了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的同时，党中央对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的工作专门作出部署，为开好专门会议奠定了又一重要基础——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5月下旬、6月初，刘云山、赵乐际、栗战书、赵洪祝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听取了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老同志的意见。

5月25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的通知》。各有关方面分别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等形式，征求了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纪委委员，不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共478位同志的意见。

随着调研和征求意见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准备工作紧张而有序地向前推进。

坚决反对“四风”、切实改进作风，中共中央政治局不负重托勇担使命

深入调研，了解的是实情民意；征求意见，收获的是肺腑之声。

据不完全统计，形成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情况的专项调研报告 106 份；各方面反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 55 份，共提出建议 800 余份。

翻开这些材料，映入眼帘的是直抒胸臆、坦陈直言，是对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信任，是对我们事业领航者的无限期许——

“持之以恒抓作风、防反弹，注意整治打折扣、搞变通”“坚决治理‘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着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进一步精简文件简报和会议活动”“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切实解决吃拿卡要问题”“着力制止滥建楼堂馆所问题”“集中治理节庆、论坛、招商会等泛滥问题”“严加整治跑官要官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用制度固化活动成果，坚持教育实践活动与当前工作两手抓”“加大监督追责力度”……这些中肯的意见建议，内容涵盖了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各个方面。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也表明，九成以上群众满意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执行八项规定；分别有超过七成和八成的群众肯定身边的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改善；八成以上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长期执行有信心。同时，也有超过五成的群众认为八项规定执行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弹现象，需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制度化建设。

一组组数据、一项项情况、一条条建议，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南海。

经过认真细致地研究梳理，最终形成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依据。

仲夏时节，中南海怀仁堂，椭圆形会议桌前

座无虚席。经过充分准备，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如期举行。

会议召开之前，每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提前拿到了这两个报告。为使会议开得高效务实，中共中央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做好会前准备还提出了明确要求：

——认真学习革命领袖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论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与有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听取意见建议；

——围绕加强作风建设、发挥表率作用进行反思和剖析，研究思考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

——自己动手撰写发言提纲，虚实并举，既谈工作，又谈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提出改进措施。

会前，调研广泛深入，准备精心充分；会上，氛围严肃和谐，发言紧扣实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开成了一次高质量的会议，达到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改进提高的目的。

会议完成了 3 项议程：听取中央八项规定贯彻执行情况和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报，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发言、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情况，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

会议特别强调，要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研究、综合评估，采取措施、完善制度，发扬“钉钉子”的精神，进一步把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到实处。

会议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制度规定。目前，20 多项具体的制度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不负人民重托，勇担时代使命。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实际行动，在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为全党作出表率，必将赢得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

（新华社 7 月 7 日 霍小光 隋笑飞 李菲）

中央国家机关带头过紧日子 一般性支出压减 5%



近日，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 2013 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 5% 比例压减。重点是压减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

据新华社电 记者 7 日从财政部获悉，为认真落实好中央关于厉行节约、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有关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近日，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对 2013 年一般性支出统一按 5% 比例压减。重点是压减办公楼和业务用房建设及修缮支出、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差旅费、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经费等。

通知同时要求，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管理，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刀刃上，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 专家说法

按去年数据推算最多省 50 亿

新京报讯（记者李蕾）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今年中央财政收入出现下滑，前 5 个月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幅仅为 0.1%。财

政部部长楼继伟此前也表示，中央财政收入完成预算目标压力很大。因此，虽然一般性支出也是必要的，但目前的状况下，要将财政收入用在更加迫切需要的地方。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有必要的，反映了政府执政理念的变化。

一般性支出指的是，会议、接待、购车、出国（境）、文件、通信等行政经费开支。财政部公布的预算和决算报告中，细分了“三公经费”的内容，但并没有列出“一般性支出”这一项目及对应数据。

根据去年的决算报告，汇总 2012 年中央行政单位履行行政管理职责、维持机关运行开支的行政经费，合计 1028.52 亿元。如果今年按 5% 的比例压减，压减的规模约为 51.4 亿元。不过白景明表示，行政经费包含的范围，比一般性支出稍微大些。

王雍君表示，压减各部门的行政经费与各部门的利益是相左的，因此在执行方面要做好监督工作。同时，统一压减 5% 是简单化的措施，因为各部门压减的空间存在差异，参差不齐，应当细化后区别对待。他判断，会议费、差旅费和车辆购置和运行经费，都有不同程度压减的空间。

■ 新闻链接

中央推进 20 余项制度“改作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前,广泛调研、征求意见 60 多天

据新华社电 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实际和所分管地方部门单位的工作实际,分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及有关制度规定。

6个半天的会期,60多天的准备。为了开好这次专门会议,从4月初开始,一场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调研,以及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的工作,在全党全国一定范围广泛开展。

调研各省区市落实八项规定情况

回顾总结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

4月中旬起,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相关部门组成调研组,分赴9个省区市、11个部门和单位,召开30多场座谈会,并对31个省区市、53个部门和单位进行书面调研,最终得出《各省区市贯彻落实八项规定项目统计表》。该表清晰地反映出全省性会议次数、天数、参加人数,文件简报数量、种类、期数,会议、接待、车辆购置、因公出国(境)费用……每一项科目都要把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的数据与上年同期进行对比。



为更好了解人民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的评价与建议,国家统计局进行了民意调查,调查范围覆盖12个省区市,调查样本量24000个,调查对象覆盖城乡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职业等群体。

征求478位同志对作风建设的意见

在全面了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的同時,党中央对有关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的工作专门作出部署。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5月下旬、6月初,刘云山、赵乐际、栗战书、赵洪祝等中央领导同志通过多种方式,分别听取了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老同志的意见。

5月25日,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的通知》。各有关方面分别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个别访谈等形式,征求了478位同志的意见。

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召开前夕,据不完全统计,形成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的专项调研报告106份;各方面反馈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的意见55份,共提出建议800余条。

经过认真细致地研究梳理,最终形成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对中央政治局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报告》,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的召开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上,还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有关制度规定。目前,20多项具体的制度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 数说

90%以上群众满意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制定和执行八项规定

70%—80%群众肯定身边的党员领导干部工作作风和社会风气改善

50%以上群众认为八项规定执行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弹现象,需加大执行力度

80%以上群众对中央八项规定长期执行有信心

(新京报)



周其仁： 再难也要坚持

改革不但要和腐败赛跑，还要和人们的期望赛跑，并和有增长之势的法外活动赛跑。跑不赢，麻烦就大了。改革是难，但拖延改革只会更难。

不久前，笔者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 35 年，改革的任務好像更为沉重了？为什么体制改起来那么难？换个角度继续讨论，既然改革这么难，不改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新体制，再也无需改革，行不行？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因为不改，更大的麻烦在后面。

第一，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

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改革，很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浏览最近新闻，刘铁男案、刘志军案、东北三把大火、延安城管“临时工”暴力执法等，当然，这么大的国家，总有负面新闻，会有偶发因素，但是，这些还是反映出高速增长的中国社会肌体里，带有令人不安的体制性疾病。

以高官贪腐案为例，涉案金额巨大，更要害的是，那似乎是“正常工作”的副产品，不能不判定现行职权利用体制存在极其巨大的漏洞。仅办贪官，不改体制，老虎苍蝇会没完没了。

一个国家粮库，一次过火就烧了几万吨存粮。仓储存粮数目过大，与价格机制被严重干扰应有某种联系。还有吉林那把大火，经济发展要支持民营经济，但民营企业也要保障工人权益。权利之间的平衡，不能仅靠各方自觉。可平时查这查那很忙，偏偏人命关天的环节没人检查、监督。此案说“政府缺位”，总不冤枉吧？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监管政府，使之不再缺位？

管也不能用延安城管那样野蛮的办法。说是“临时工”所为，可事发整整七天之后，城管局



长才现身道歉。他到底忙什么去了？官员不忙正事，老百姓也奈何他不得，如此官制怎能不改？

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总特征就是高位下行。“上山容易下山难”，很多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会加大。所以，现在的形势，还不是摆开架式做最优的顶层设计，或慢慢摸到石头再过河。很多问题久拖不决，正派生出更多问题。

第二，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对理想社会有更高的预期。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年—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达不到理想境界，就不可能满意。

从年龄结构看，现在承担较高职位者还是对中国历史、改革前后有比较的这代人。但是，社会主体、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是什么，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更高一点，所以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就更不可容忍？一个社会真有希望，一定是一代比一代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要是改进的速度慢，跟不上年轻一代人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可能让失望的情绪弥漫，无法动员一代代人面对并解决问题。

第三，很多制度性变量改得过慢，总不到位，正在激发法外行为、法外现象滋生。

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行为不在法律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举一个小例子，民航客机落

地时，广播里一定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但前后左右，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弄得有一位老外问是不是他听错了？但是，你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可以打开手机了。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手机没有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地让大家打开手机？

这是说，很多人的“有法不依”，有时实在是因为那个法定的东西不合理，改一改就不难做到有法必依。但是，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根本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不守法，才能过日子。

不少城市都有“黑车”，常常是“白车”门槛过高、负担太重，以及服务不到。再看所谓“小产权房”，法律上没地位，现实中有市场。还有过时的人口控制政策，催生多少“黑户”？金融改革讲“利率市场化”，讨论得很热闹。可走进生活，哪种利率模式没有？所以，法外的世界很热闹，到处都是“中国式过马路”。

讲到这些问题，“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我碰，那个不让我改，但似乎忘了一个大道理，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能力，就要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行为，尽可能纳入法内框架否则，很多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是最大的制度失败。

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革的的确。但是，拖延改革，会更难。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2013年第24期《新世纪》。作者为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选自作者在6月8日北大光华学院与财新传媒主办的江南论坛上的发言。）

两会后第四波人事更替：

12省份常委密集调整

此次省级常委调整已涉及12个省份，包括北京、上海、重庆三大直辖市和福建、江西、贵州等省份，地域范围横跨东、中、西。这也是今年“两会”之后第四波较为密集的省级常委班子调整。

近日，省级常委班子调整继续展开，先后有重庆、贵州、上海、青海、湖南、河北、西藏、江西、湖北等12个省份进行了调整。从年龄上看，此次履新的省委常委，大多数都是“60后”，其中多位是科班出身的博士。

渝沪调整

在这一波调整中，重庆的调整幅度最大。重庆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常委徐松南接任徐敬业的市委书记一职，凌月明、曾庆红（女）任市委常委。徐敬业、范照兵不再担任市委常委职务。

1951年9月生的徐敬业已在今年1月的重庆市政协四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重庆市政协主席。范照兵则调任河北，担任河北省常委。

新晋两名重庆市委常委都是“60后”。凌月明1962年10月生，2008年1月起任重庆市副市长，主管城乡建设、交通、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等领域。今年4月，凌月明兼任两江新区党工委书记，并任管委会主任。两江新区是2010年6月挂牌，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之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也是目前重庆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区域。作为两江新区的新任一把手，晋升重庆市委常委也顺理成章。

新任重庆市委常委曾庆红也是1962年出生，今年1月刚当选为江西省副省长。

另一直辖市上海的调整与重庆有部分相似。近日，中共中央批准，沈晓明、姜平任上海市委常委。

今年5月，50岁的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被任命为浦东新区区委书记，接替转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前任新区书记徐麟。另一新晋市委常委姜平是浙江杭州人，曾在浦东新区任职多年，从2011年4月开始担任上海市副市长。

“65后”陈刚入黔

近日，中共中央批准陈刚任贵州省委委员、常委。贵州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决定：陈刚任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不再担任贵阳市委书记。此前4月，李军已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

1965年4月出生的陈刚是江苏高邮人，25岁从北京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玻璃研究所工作，先后担任晶体室工程师、副主任、玻璃研究所副所长等职，1994年7月—2000年7月，任北京一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北京玻璃研究院副院长。

2000年7月，陈刚由企入仕，担任北京市外经贸委副主任，2003年开始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务。

2012年7月，北京市市委换届选举，陈刚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另一位陈刚同时当选北京市委常委，两人同为“65后”。此次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也结束了北京“一市两陈刚”的格局。

此次转任贵阳，拥有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职称、长期在北京核心区朝阳区主政的陈刚颇受当地政经界期待。近几年来，在工业强省和城镇化的带动下，贵州经济增速名列全国前茅。值得注意的是，贵州现任书记、省长均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省委书记赵克志此前曾担任江苏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贵州省省长陈敏尔曾任浙江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当地政经观察人士对《第一财经（微博）日报》分析，从沿海发达地区调入的主政领导首先改变的是当地政界的精神状态，包括做事风格、眼界

和胸怀视野,同时也带去很多发达地区的资源,不少企业也会随之将投资瞄准贵州。

陈刚也是目前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中,第三个“65后”的“一把手”。另外两位分别是1965年4月出生的青海省委常委、西宁市委书记王小兵,1968年7月出生的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杨岳也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级党委常委。

两湖微调

中部的两湖和江西均进行了微调。湖北方面,王君正任湖北省委常委。今年50岁的王君正去年9月开始担任湖北省副省长,5月接替调任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的范锐平,担任襄阳市委书记。襄阳市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湖北省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之一(另外一个为宜昌市)。

湖南方面,湖南省副省长韩永文近日被任命为湖南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前任省委秘书长易炼红已在今年5月出任长沙市委书记一职。

江西方面,据《江西日报》报道,近日,新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赵爱明(女)在南昌走访慰问了部分正省级老同志。此前,赵爱明担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国资委主任、党委书记。

西部的西藏和青海也进行了调整。西藏方面,多托、丁业现、王瑞连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其中,多托目前任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那曲地委书记,丁业现目前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王瑞连为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常务副书记。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自治区西藏的党委常委组成人数要高于一般内地省份(13人)。在前年的省级党委换届中,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共有15人组成。此次调整后,目前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也已补齐。

青海方面,今年1月新晋青海省委常委的王令浚在担任青海省政法委书记仅4个多月后,转任青海省委组织部部长,前任青海省委组织部部长齐玉已于今年5月调任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1965年

5月出生的王令浚也是目前第二个“65后”的省级组织部部长,另一位是1966年4月出生的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范锐平。

“两会”后第四波密集调整

截至目前,本轮省级常委调整已涉及12个省份,包括北京、上海、重庆三大直辖市和福建、江西、贵州等省份,地域范围横跨东、中、西。这也是今年“两会”之后第四波较为密集的省级常委班子调整。

其中,第一波调整是今年两会之后部分省份调整了党政一把手;第二波调整则是4月中下旬部分省份的专职副书记进行了调整;紧随其后的第三波是5月中下旬,多个省份的省级组织部部长密集调整;近期进行的第四波常委班子调整涉及的职位比较多样,既有贵阳、两江新区、浦东新区、襄樊这样的重点城市(区),也有重庆、福建的纪委书记职位,青海、江西的省委组织部部长职位,以及湖南省委秘书长等职位。

因此,本轮调整主要是针对此前几轮调整的一个延续和补充。经过本轮调整,大部分省份的常委班子基本补充到位。

从年龄上看,此次履新的省委常委,大多数都是“60后”。其中多位是科班出身的博士。如上海市委常委沈晓明是医学博士、教授,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儿童保健专家,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校长。福建省委常委倪岳峰是毕业于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工学博士,师承原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院士。2003年3月,39岁的倪岳峰与郑功成、信春鹰等其他年轻专业人士一道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批10位“专职常委会委员”之一,是环境立法和环境规划方面的权威。

新任贵阳市委书记陈刚是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理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而接替陈刚担任北京市委常委的苟仲文,是工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是一位科班出身的电子工程专家,曾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

(7月9日 人民网)

中国缺席 全球腐败报告



中国腐败有多严重？别问。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称，这是该组织在进行有关腐败的调查时，从中国市场调研公司得到的答案。

透明国际的一位发言人通过电子邮件回答提问时说，他们接触了多家中国当地的研究公司，不过这些公司觉得不太可能在中国开展这一类调查，除非将许多问题略过不问。透明国际的总部位于德国柏林。

周二，透明国际发布了一份腐败调查报告，该组织近几周对这份报告进行了高调宣传，称其为“有关腐败的史上最大规模民意调查”。

尽管调查覆盖了107个国家的114,000人，但透明国际在其48页的《2013全球腐败指数》（Global Corruption Barometer 2013）中却完全没有提到中国。在该组织网站上国别报告的下拉菜单中，读者可以看到的选项从智利直接跳到了哥伦比亚，无法找到中国。

透明国际的发言人说，从国别覆盖面来讲，中国的确是这份调查主要的遗漏之处。不过该组织依然坚信《全球腐败指数》传递的整体信息和结果能体现全球的情况。他说，该组织每次进行调查时都试图将中国囊括进来，不过至今这仍是个艰巨的挑战。

在中国，腐败是个被普遍谈论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高层反复强调，官员腐败是对执政合法性的最大威胁。今年3月，刚就任国家主席不

久的习近平敦促新领导层称，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决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作斗争”。

多家市场调研机构表示，考虑到政府对国内所有类型媒体的控制，在中国深入调查腐败问题过于敏感。

去年10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称，该机构一份调查中的半数中国受访者认为官员腐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皮尤称他们聘请了一家北京的机构对一系列与社会、政治有关的问题进行调查，试图了解受访者关于这些问题的态度，其中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贿赂商界人士是：A. 非常严重的问题；B. 较为严重的问题；C. 小问题；D. 不是问题”。

透明国际的调查方式更加直接：他们一开始就预设腐败问题无处不在。

为了撰写《全球腐败指数》报告，透明国际采用了只关注受贿、读职和以权谋私的多问题调查。世界各地的受访者都从下面这个尖锐的问题开始作答：在过去两年中，本国的腐败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外国人的看法是用来衡量中国腐败状况的一种方式。在透明国际去年以此编制的174国贪腐印象指数中，中国列第80位。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13年7月11日 James T. Areddy 发稿）

中青报空难报道献媚言论引网友痛批



Reuters

上周六，乘客从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失事的波音777飞机里走出来。

韩国一位新闻主播对上周六韩亚航空（Asiana Airlines）客机失事致两名中国学生遇难的冷血评论引发众怒才刚刚过去几天，一家中国报纸就因刊登一篇追忆逝者的文章有拍地方官员马屁之嫌而更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Associated Press

叶梦圆（左）和王琳佳（右），她们在上周六韩亚飞机失事事故中遇难。

《中国青年报》周二刊登的文章《花谢旧金山》有这样一段描写：“如果她们在

世，知道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在关注她俩，王琳佳也许会惊喜地睁大了眼睛，笑咪咪的，而叶梦圆也许不敢相信地跳了起来。”

16岁的王琳佳和叶梦圆是浙江省名校江山中学（Jiangshan Middle School）的学生，也就是那两名在韩亚飞机失事事故中遇难的乘客。本周，全国上下都在哀悼这两名不幸遇难的花季少女。

韩国电视台 Channel A 的一位主持人在周日播报这起事故时说，万幸遇难者是中国人而非韩国人。此言一出，立即在中韩两国均引发轩然大波。

但是《中国青年报》周二的报道引发了中国网民更加尖锐的反应。许多微博用户称，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庄庆鸿“无耻”、“谄媚至极”，要求她辞职。

上海复旦大学（Fudan University）新闻学教授陆晔在新浪（Sina Corp.）微博上写道：“这不仅基本的新闻伦理问题，更是基本的做人底线问题。”

《中国青年报》周二下午删除了电子报（中文）中有争议的这一段话。该报在新浪微博上发声明称：“行文确实不妥，中青报已删除电子报里的这一段，并诚恳接受所有的批评。”

接听了电话的《中国青年报》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表示，该报正在处理这件事，但未透露更多细节。

庄庆鸿没有回应记者的置评请求。但她用自己的微博帐户回应了相关争议，称整体文本是为了纪念两位逝者。她还有一条微博中写道：“我们的意思一点也不是用生命换关注啊，网友，说的就是如果她们在世啊。‘上上学看到不会很高兴吗？’的意思啊。”但这似乎只是火上浇油。（下转第16页）

纽约时报： 美国如何利用科技扫荡全球数据

美国媒体称，媒体近日的披露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让外界得以一窥位于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日渐增大的影响力。

据《纽约时报》6月13日报道，新的爆料揭示，国家安全局（NSA）一直在秘密地获取数百万美国人的电话记录，还从9家美国互联网公司得到外国人的电子邮件、视频和其他数据。爆料为了解美国这家最大的情报机构不断增长的能力提供了罕见的一瞥。

报道称，随着数字通讯量在过去10年中爆炸

式地增长，追踪恐怖分子的美国分析师为了寻求处理大量电话记录、电子邮件和其他数据的新方法，求助于硅谷的计算机专家，这些专家曾建立了复杂的方程，阻止了俄罗斯黑社会进行信用卡欺诈的企图。为此，NSA和其他情报界部门与技术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帕兰提尔技术公司就是其中的一个，帕兰提尔由一群来自贝宝的投资者创建，他们正忙于解开“大数据”的秘密。

如今，软件技术的革命使对规模巨大的数字

（上接第15页）“体制下的奴隶，能有一点真正的想法吗？”一位微博网友在回覆中评论道。

这起风波反映出，中国国内对于一家中国官方主导的媒体常常挖空心思歌颂官员政绩的沮丧之情日益高涨。阅读新闻的公众对《中国青年报》尤为失望，这份共青团麾下的报纸曾经获得敢于针砭时弊的美誉，但在监管者2006年叫停著名的《冰点》周刊之后，该报纸也渐渐噤声。

网友们还挖了庄庆鸿的“老底”。他们翻出2009年她与一位中青报编辑联合撰写的文章，该文指控著名律师李庄在重庆案件中“伪造证据”。在为被指为重庆黑帮“老大”的龚刚模辩护后，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随后他试图起诉《中国青年报》及两名记者诽谤。法律界普遍批评这两名记者立场偏颇，并且充当重庆市政府的喉舌。

尽管中国国内一直以来都有记者对官员卑躬屈膝的传统，但随着网络另类新闻来源的不断增加，民众越来越难以容忍某些新闻工作者明显的谄媚嘴脸。许多微博网友将庄庆鸿与2008年臭名昭著的马屁诗相提并论。当时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汶川地震后发表了一首诗，其中有“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以及“纵作鬼，也幸福”等句子。

中青报的几名记者已经在微博实名认证帐号上代表报纸向公共致歉。

不过，尽管骂声如潮，但庄庆鸿之前对钱云会一案的报道在国内也获得了一些掌声。钱云会是浙江省一位村民，生前曾为地方政府的征地问题而多次上访，其惨死在网络上引起一片哗然。

（2013年7月10日15:17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Xiaoqing Pi）



信息进行自动及瞬时的分析变成可能，也给 NSA 带来变化，使其成为美国人乃至外国人数字资产的事实上的拥有者。这些新技术有史以来第一次使美国间谍能跟踪世界上几乎任何地方的人的活动和往来，而无需实际监视他们或监听他们的对话。

为了能利用每天产生的堆积如山的新数据，在几乎没有公众讨论的情况下，NSA 在迅速扩张。在过去 10 年里，政府给该机构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在犹他州的山区修建了一座面积达 100 万平方英尺（约合 10 万平方米）的城堡，显然是用来无限期地存储巨量的个人数据。前业界和情报官员称，NSA 在美国各地建立了窃听站，并帮助建造了一台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以破解保护信息的编码。

有人曾一度认为互联网流通的数据量太大，以至于超出 NSA 的分析能力，然而，最近的爆料显示，该机构的能力远比大多数局外人所认为的要强。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的计算机科学和通讯专家赫伯特·S·林说，“5 年前，我会说他们没有能力监视互联网流量中的大部分。”现在他说，看来“他们已经接近这个目标。”

6 月 8 日，人们得以看到他们到底有多接近。一份由《卫报》援引的 NSA 文件，展示了一张“全球热度图”，该图看似表示了 NSA 从世界各地

汲取的数据量。

2013 年 3 月总共从全世界互联网上收集到 970 亿条数据；其中 14% 来自伊朗，有许多来自巴基斯坦，另有约 3% 来自美国本土，不过其中一些可能是流经美国服务器的外国数据量。

重点的转移

数据专家称，该机构有效地挖掘元数据的能力，已经使窃听和偷听通讯内容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元数据指的是关于谁在打电话或发邮件的信息。

总部在华盛顿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的负责人马克·卢腾伯格说：“美国法律和美国的政策把通讯内容视为最为私密且最有价值的，但这在今天已经过时了。”“如今，与通讯关联的信息远比通讯内容本身更重要，那些从事数据挖掘的人都清楚这一点。”

报道指出，美国法律限制窃听和偷听美国公民通讯的实际内容，但对于打电话这个行为所产生的数据只有很少的保护。而且，对于其他与电话无关的数据，例如用信用卡付账，几乎没有法律保护。

当不同的数据流被整合到大型数据库中后，例如把使用手机的时间和地点与信用卡购物、或使用 E-ZPass 电子收费系统的数据相匹配，情报分析师能获得一个人生活的不同侧面，而在过去，仅靠偷听他们的谈话绝对无法得到这么多。《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有关打一次移动电话的地点和时间的仅仅四条数据，足以在 95% 的情况下确定打电话者的身份。

一名为政府工作的计算机科学家说：“我们能发现各种各样的关联和模式，这方面的技术已有重大的进展。”由于没有获准作公开评论，这位人士要求匿名。

保密项目

报道称,2001年10月,乔治·W·布什总统秘密启动了国家安全局的无授权监听项目,在无需获得法院授权的情况下监听美国公民的国际电话和电子邮件,与这个项目同时进行的是大规模的数据挖掘活动。

这些保密项目导致了2004年3月在时任司法部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病房里的一次较量,较量的一方是布什的白宫官员,另一方是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几个官员。愿意让无授权监听进行下去的司法部律师辩称,是数据挖掘引发了更多与宪法有涉的担忧。

阿什克罗夫特病房里的对峙发生前的一个月,哈佛大学的本科生马克·扎克伯格创立了 Facebook; Twitter 的创立是在两年多以后。苹果的 iPhone 和 iPad 当时还不存在。

电子前沿基金会技术分析师丹·奥尔巴赫观察说,“越来越多的像谷歌和 Facebook 这样的服务,正在变成信息的大型中央贮藏库。它们所贮藏的大批数据,对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来说,是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目标。”据行业分析人士称,长期以来,情报机构一直是对高级计算和数据挖掘软件需求最强烈的客户之一,近年来尤其是这样。一名曾担任技术高管的人士说,“他们对你说,某地有一个美国人将要被炸死,唯一——个能阻止爆炸发生、让他活下去的人就是你。”

根据 IBM 公司的估计,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社交媒体网站、电子邮件和其他形式的数字通讯的广泛使用,全球每天产生 250 亿字节的新数据。在全球现存数据中,有 90% 是过去两年中产生的。根据国际数据公司的一项研究,预计从现在起到 2020 年,数字世界的规模将每两年翻一番。

和爆炸性的数据增长相伴的,是分析这些数据能力的快速进步。IBM 的“沃森”是一个最

好的例子,它展示了数据密集型的人工智能的强大力量。“沃森”是一台超级计算机,在 2011 年击败了《危险边缘》(Jeopardy!, 美国的智力竞猜节目)的人类冠军。

分析人士说,“沃森”式的计算,正是处理海量数据所需的技术,它能即时分析互联网通讯数据,发现可疑的在线行为模式,因此能缩小恐怖分子的搜索范围。一名曾给政府提供咨询的顾问说,过去两年里,NSA 和中央情报局都在测试用“沃森”,因为他未获准公开谈论此事,所以要求匿名。

三边测量法

业内专家说,情报部门和执法机构还在使用一种被称为三边测量法的新技术,它能够从一个时刻到下一个时刻地跟踪人的位置。从手机蜂窝塔得到的数据能够跟踪一个人所在的海拔高度,精度足以确定该人在某栋建筑的某一层。甚至还有软件能够通过分析手机数据,寻求预测一个人最可能采取的路线。网络和数据中心专家亚历克斯·菲尔丁说,“这是极端的‘老大哥’(英国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监控全体国民的独裁者)”。

最近披露的消息没有证据表明,NSA 的窃听者对普通美国人的窃听违反了法律。6月7日,奥巴马为国家安全局收集电话记录和其他元数据的做法辩护,称其不涉及偷听谈话内容、或阅读电子邮件内容。然而,隐私权倡导者说,必须进行全国讨论,以制定新的法规,来限制情报界对大量新数据的获取。

卢腾伯格说:“那种认为政府能缴获如此大量的信息,却不会影响美国公民享有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权利的想法,有点是幻想。”他指的是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的权利。

(参考消息网)

延安整风： 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史上的丰碑



战士们在进行整风学习。资料照片

中国共产党自1942年春起，以延安为中心，开展了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对强化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堪称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的一座极其重要的丰碑。

一、延安整风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道路

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党内先后出现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从思想根源上来说都是主观主义，都表现为理论同实际相脱离，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其结果是给党和革命的发展带来严重危害，“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作为供全党学习的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光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内国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提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突出地

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做到“有的放矢”。毛泽东把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作为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而加以强调，引起了全党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全党的一种共识。延安整风既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和苏联经验模式化的错误倾向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员干部，使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对于全党坚持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确立和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二、延安整风为党的第一代成熟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领导”，即毛泽东开始事实上成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开始被确认为党的最高领袖，洛甫“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1943年3月，中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组织形式上和实际工作中都成了最高领袖，正式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经过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1944年5月，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表明“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

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整风运动使“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1945年6月,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此后毛泽东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七大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的领导集体,从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稳固地确立起来了。

三、延安整风为中国共产党胜利领导中国革命总结了丰硕的理论成果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逐渐形成了科学的体系,整风运动促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整风运动中,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全党一致认识到:“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即毛泽东思想。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王稼祥于1943年7月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七大上全面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共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指明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写入了党章,正式

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长期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经验被总结概括出来,并被明确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整风的一大理论成果。

四、延安整风为党的团结统一开辟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同时期曾出现过各种错误,虽然全党与之展开了不懈斗争,但并没有总结出积极有效的克服党内错误倾向的正确方针。遵义会议后,中共一步步走向成熟,并在同张国焘、王明等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得到锤炼,认真吸取了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初步形成了关于正确克服党内错误倾向的一些方针政策。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指导这次运动的基本方针亦即正确克服党内错误倾向的方针:“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即“团结——批评——团结”。1943年9月开始,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三次会议,毛泽东强调检讨王明的错误,要用“历史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自我批评的方法”,“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44年,毛泽东又讲:“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更为明确地指出,要“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地开展党内的思想教育。”事实证明,延安整风明确提出并认真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为党的健康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富有成效的实践路径。

(《光明日报》作者单位:长春理工大学马列学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